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韓國禪教史（上）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編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四二冊

韓國禪教史（上）

忽滑谷快天著 朱謙之譯



中國書店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PDG

本冊說明

《韓國禪教史》是日本近代著名佛教學者忽滑谷快天撰寫的一部佛教著作，全書共四編，敘述了禪、教兩宗在朝鮮半島的演變和發展過程。本書資料搜集全面，其中收錄了相當多的原始佛教資料、碑刻銘文及學者的研究成果，甚至包括中國的史書；對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作了縝密的考證，在歷史的論述與介紹方面也秉持了較為客觀的態度。

呈現于讀者眼前的這部中譯本由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朱謙之先生于上世紀 60 年代譯出。中國古代乃至近代以來，一直缺乏對朝鮮半島佛教發展史、中韓佛教交流歷史的深入研究和系統的數據整理，甚為可惜。直到 1949 年以後，中國學者纔開始對朝鮮半島的佛教歷史有所關注。早在上世紀 60 年代，朱謙之先生便敏銳地注意到了當時歐美的禪宗研究熱潮，于是着手翻譯了這部《韓國禪教史》，為他以後撰寫《禪學史》積累數據。

由于時代原因，有關宗教及其研究的書籍在當時無法出版。但朱先生仍然對該書的翻譯傾注了全部精力，譯文完全忠于原著，語言十分嚴謹，甚至原書中許多有誤的地方，朱先生也加以考訂和修正，足見先生學問之精深、治學態度之密慎。

此次重新出版先生的譯作，對原書使用的異體字進行了訂正，除專有名詞外，均改為通用的繁體，在內容上則保留原貌，不作任何改動。

朱謙之譯
忽谷滑快天著

韓國禪教史（上）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序

黃心川

佛教是傳統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公元前 6 世紀左右由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立。公元前 3 世紀時開始由印度向外傳播，約在 1 世紀左右經由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內地，復由中國再傳入韓國、日本、越南等國。

韓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自古以來有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係，在兩國人民交往中，凝成了深厚的友誼。宗教文化是兩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交流內容之一，特別是佛教作為文化交流關係的紐帶，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已逾 1500 餘年的歷史。

一

中國佛教最早傳入高句麗大概在第十七代君主小獸林王二年（372），當時前秦苻堅曾派使者及僧順道送去佛經和佛像，小獸林王也遣使者答謝。越 2 年東晉僧阿道又去高句麗，高句麗王在首都輯安附近的丸都城建省門寺和伊弗蘭寺供順道和阿道居住。晉孝武太元之末（396），白足和尚曇始齎經律數十部經往遼東弘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平原王十八年（576），大丞相高德派遣沙門義淵入中國北齊都城鄴（今河南臨彰縣西）向定國寺和尚法上詢問佛教的緣由。宋末齊初，高句麗僧道朗由遼東至江南，從曇慶學三論，在攝山嗣法于黃龍（今吉林地區）法度，

學習《華嚴》等經義。天監十一年（512），梁武帝遣僧正智寂、僧懷、惠令等10人詣攝山從僧朗學習三論、《華嚴》，武帝還根據僧朗的義解作章疏。

佛教傳入朝鮮半島西南的百濟稍晚于高句麗。枕流王元年（384），梵僧摩羅難陀由東晉到達百濟的漢山城，受到百濟王的熱誠接待，翌年創佛寺于漢山，度僧十人。此後佛教在百濟日益興盛，“僧尼寺塔甚多”。在中朝交通的門戶——泰安豐島的瑞山和唐津的西海岸建有泰安摩崖伽藍、雲山摩崖伽藍、百濟金剛佛伽藍和修德寺等等。梁武帝大同七年（541），百濟遣使赴梁求《涅槃》等經義并工匠畫師。

位于朝鮮半島東南的新羅，一般認為佛教是在訥祗王時（417—418年）由高句麗輸入的。在南北朝時，新羅有不少僧人來我國求學巡禮。據不完整統計，自6世紀中葉到7世紀末的150年間，到中國和印度求法的新羅僧共21人，其中去印度的有9人；到中國的著名高僧有玄光、明觀、無相、圓光、智明、安含、慈藏等人。梁武帝太清三年（549），遣使沈瑠并新羅學僧覺德送佛陀舍利至新羅，新羅真興王奉迎于興輪寺。陳文帝于天嘉六年（565），遣使劉思及留學僧明觀至新羅送佛教經論2700餘卷，新羅的經籍臻于完備。

二

6世紀末至10世紀初是中國歷史上的隋唐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鼎盛時代。佛教在隋唐統治階級的扶持下，走上了興盛的道路，完成了外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

先後出現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和禪宗等佛教宗派，同時也對其它鄰近國家的佛教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時期正是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而又統一時期。7世紀中葉，新羅聯合唐王朝，先後滅亡百濟和高句麗，統一了朝鮮半島。新羅統一王朝的建立，對內採取了中央集權的各項政治措施，完備了九州（地方最大的行政區域）、五京（特殊的行政區域）和郡縣制，加強了對各級地方官吏的監督，在經濟上採取獎勵生產的各項措施，大興水利，提高耕作技術，鑄兵器為農器，實行丁田制（按丁男、丁女分給一定數量的土地），因之出現了“家給人民，民間安堵，域內無虞，倉廩積于丘山”的局面。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生活安定，文化藝術也隨之出現了繁榮景象，為朝鮮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礎。新羅政權還積極拓展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學生來唐朝學習中國文化，最多的一次曾達100餘人。統治階級出于政治的需要，一方面大力扶植儒教的勢力，另一方面又支持佛教、道教的發展。隨着新羅佛教的繁榮，國家陸續派出了不少僧侶來中國求法和巡禮，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新羅時期來華僧達117人。他們在華廣參名山諸耆，參預譯場活動，著書立說，回國時携去大量的佛教經籍和文物，繼續從事佛教經論的宣傳和研究，或開山授徒，在國內建立了具有新羅民族特點的佛教宗派或學派，與中國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應。

這一時期中國佛教的學派或宗派除地論、毗曇少數派別外，大多數都先後傳入了韓國，形成了“五教九山”之說。五教是五種佛教宗派，它們是：

一、涅槃宗 主要依據《涅槃經》經義所建立的。由

新羅武烈王時期（654—660年）的普德和尚開創。對《涅槃經》有研究成就的學者有元曉、義湘、憬興、義寂、大賢等人。涅槃宗有八大伽藍，根本道場是景福寺，創始人普德和尚，有無上、金趣等高足。

二、律宗 善德女王時代（632—646年）由慈藏創建於梁州通度寺，曾設壇施戒。慈藏於636年率弟子僧實等入唐，在終南山云際寺學南山律，回國後任大僧統，在芬皇寺開講《菩薩戒本》，整頓和修訂了朝鮮僧尼戒律。

三、華嚴宗 有二個派別。一為義湘所傳的中國華嚴宗思想體系的浮石宗；另一為元曉獨自開創的海東宗。前者以浮石寺為中心，宣傳智儼、法藏的思想，曾有弟子三千，湘門十德；後者以闡揚元曉的《華嚴經疏》、《大乘起信論疏》為宗旨，以《十門和諍論》調和百家的爭論。

四、法相宗 由真表律師於8世紀中葉在金山寺創建。承玄奘——圓測——道證——憬興——大賢的法統。圓測終身留在中國，傳印度唯識宗安慧一系的學說。其弟子道證作《攝大乘論世親論疏》進一步發揮其師的思想。以後憬興作《成唯識論義記》、《瑜伽論疏》，順憬作《成唯識論科簡》等，為新羅法相宗奠定了理論基礎。

五、法性宗 以弘揚《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宗旨，闡述諸法實性之義。東晉僧阿道、順道及高句麗僧曇始曾傳播“三論”思想。梁末隋初高句麗的實法師和印法師大力弘揚三論。新羅統一三國後，元曉曾著《三論宗要》、《廣百論宗要》等，繼續闡述法相學說，但不久即衰微。

此外，除上述五宗之外，還有一些小宗派一度傳承。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明朗建立的神印宗傳雜部密法；惠通建

立的總持宗傳唐善無畏的印訣，以後又有明曉、惠日、慧超等人傳唐金剛智、不空等人的密法。屬於小乘佛教的成實、俱舍學派也很早傳入到朝鮮半島。

九山是指新羅時期佛教禪宗的九個派別。據說新羅僧法朗曾到中國從禪宗四祖道信受法，回國後傳法于弟子神行，以後神行又來華學習北宗禪。不久，新羅僧道義入唐從馬祖道一弟子西堂智藏學習惠能的南宗禪，回國後從事于南宗禪的弘化，又經來唐學習的新羅僧慧昭、無染、慧日、道元、玄晃等禪門宗徒的闡揚，南宗禪成為新羅禪宗的主流，形成了實相、迦智、闍崛、桐里、聖住、師子、曦陽、鳳林及高麗初期建立的須彌山的“禪門九山”。

新羅王朝末期，由于統治階級加深了對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壓迫及剝削，中央與地方勢力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自宣德王(780—785年)即位至新羅最後敬師王(927—935年)的150年間，王室內部為了爭奪帝座，進行了血腥的殘殺，先後有20個國王像走馬燈一樣登上王位。佛教在這個時期雖然在政治上和社會生活上還有重要的影響，但前一個時期的具有思辨色彩的、為貴族所信奉的“教學佛教”已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在佛教內部出現了兩種新的潮流：一是注意實踐方法的禪宗，這個派別在群眾中有廣泛的影響；二是在民間廣為流行的崇拜阿彌陀佛、觀音和彌勒的淨土信仰，此外還出現了把佛教功德報應思想和道教的陰陽五行及地理風水學說相結合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趨向民間化和神秘化。大約在9世紀初，禪宗在新羅崛起，逐漸壓倒了其它宗派，成為後來各朝佛教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

10世紀初，原爲新羅大臣的王建建立高麗王朝，取代原有的新羅王朝。高麗王朝存在了400餘年，歷代諸王都篤信佛教，熱衷于佛事。高麗太祖以護法者自居，即位後大興佛寺，禮待僧侶，開辦法會，國內佛教氣氛隆盛，臨終時遺言強調要護持佛法。後出的很多王室人員競相出家，甚至朝廷後來規定多子家庭必須送一個兒子到寺廟出家的制度，推動了社會上崇佛的熱潮。高麗時代，朝廷還實行了選拔僧侶的僧科考試制度，參加考試的僧人先在寺裏進行預考，及格後再參加國家的統一考試，凡考試及格者可以獲得官方授予的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首座、大禪師、僧統等各種僧職，有的甚至被奉爲王師或國師。管理僧人的僧官制度也在此時完備起來，以僧錄司來管理僧界的活動。11世紀初從顯宗經德宗、靖宗至文宗幾十年時間，朝廷雕刻了高麗藏經1106部，5048卷。高宗十九年（1232）藏經雕板被入侵蒙古士兵焚毀，于是又于1236年傾盡國力重新雕刻，1251年再次雕成，雕板至今仍然保存在海印寺內。

高麗佛教界內部主要形成了禪宗和教宗兩大系統。前者以九山禪門爲主，各山競立，互相演運，一時高僧大德各領風騷。以後天台宗興起，禪門一度受挫，不久又重新恢復。學一、坦然等人開創了曹溪宗，知訥改爲曹溪禪社，提倡頓悟的修禪法。禪宗中興，禪風大化，許多禪宗僧侶被封爲國師，受到帝王的禮待。至高麗末期，被稱爲“禪宗巨匠”的普愚和慧勤大力弘揚，曹溪一宗在諸宗派中獨

教宗是指除禪宗以外的其它佛教宗派，^①如華嚴宗、瑜伽宗、天台宗等。這些宗派在理論上有自己的特色，帶有學派的特點，不同于禪宗直指人心的頓悟法門特色實踐。華嚴宗經新羅時期義湘的闡發後，到高麗時形成了北岳、南岳兩家，培養了不少精研華嚴理論的大家，尤以法印國師坦文最突出。瑜伽宗宣傳萬法唯識的學說，有些宗徒成為王師，曾向國王講說唯識教義。這一派後來又被稱為慈恩宗，在高麗時代曾幾度沉寂和復出。

高麗佛教最突出的表現還有義天開創的天台宗。義天是文宗王之子，幼時出家受學華嚴，後到中國求學，回國後建立了天台宗，弘傳天台教觀。他還在高麗建立了仿中國建制的國清寺，在各地開設了六大本山，一時學者輻湊，眾徒雲集。天台宗自義天之後，在高麗一直興盛。

佛教在高麗發生巨大的影響，但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弊病。大興寺塔和名目眾多的佛事活動勢必耗費國庫的大量錢財，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同時又刺激了一些人為逃避勞役和想擺脫現實諸種苦難而紛紛遁入空門，僧伽雖然壯大可觀，但僧人的素質却未能相應提高，佛教徒的成分十分混雜，參差不齊。片面追求攘災祈福成為佛教界的日常主要活動。因之社會上抨擊佛教，反佛的呼聲日益高漲，佛教成為眾矢之的。

① 一些韓國學者認為高麗前期教宗所屬的華嚴、瑜伽等雖已形成宗派的形態，但全然看不到明確的宗名，該用宗名的時候是用的業，如華嚴業、瑜伽業等。參見《韓國佛教史概說》，第93頁，金煥泰著，柳雪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四

14世紀末高麗武臣李成桂擁兵自重，廢黜高麗恭讓王，建立了朝鮮王朝。太祖李成桂曾受到高麗王朝崇佛的影響，對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政策，生前曾封僧人爲王師，在宮中齋僧，舉辦法事，雕刻經板，興建佛寺等活動。但是由于佛教在社會上曾有一些不良影響，排佛的呼聲仍然不斷，太祖崇佛的措施并未能挽救佛教下頹的趨勢。到太宗繼位後，朝廷實行了尊儒仰佛的措施，淘汰僧侶，限制寺院奴婢的數量，削減寺刹總數等。以後多數帝王都遵循了太宗的抑佛政策，如世宗廢除僧錄司制度，將諸宗并爲禪教兩宗，文宗禁止百姓出家，僧尼不得進入都城等等。其間雖有個別帝王或太妃有興佛之舉，但没能挽救佛教的下滑趨勢。

由于受到政府的打擊，在佛教界內部很多教團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諸山各自分立，僅依靠師資脉脉相承的制度得以保存下來。僧侶因不得進入都城，祇能在山林中栖隱，影響十分有限，韓國的佛教學者將這一時期的佛教概括爲“山僧時代的佛教”。其間，雖然有一些高僧做過復興佛教的種種活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主要限制在民間範圍。佛教界爲了生存和發展，一方面向朝廷呼籲放寬政策，另一方面進行自我調整，振作僧侶紀綱，創立僧風糾察機構，力圖以新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佛教的教學也轉向禪教結合、儒釋融匯的道路，禪宗成爲當時佛教最有勢力的僧團之一。總的說來這一時期的朝鮮佛教雖然已不可能和百濟、新羅、高麗等期的佛教盛世相比，但是它

在民間仍然有着廣泛的影響，中央政權儘管對它採取了嚴格的控制和限制政策，然而各地的地方政權在執行這一政策時並沒有認真地貫徹，於是造成了佛教在京城影響不大，在地方和民間仍有潛在的力量的狀況。

朝鮮王朝時期正值日本大舉入侵之際，佛教僧侶在反對侵略者的鬥爭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僧人靈圭曾組織義僧軍，拿起簡陋的竹槍、鐮刀率兵勤王，打退了重圍的倭寇。靈圭率 800 僧家弟子在與倭寇的戰鬥中，表現十分勇敢，最後全部以身殉國，譜寫了一曲佛教僧人愛國抗爭、反對外侵的贊歌，受到了人們的敬仰。這一時期參加反對倭寇的佛教義僧達 5000 人，73 歲的西山大師為僧軍的首領，他們挽救了國家。由於佛教僧侶在抗倭救國鬥爭表現非凡，改變了朝廷和世人對佛教的看法，在朝鮮王朝末期，佛教有所恢復。

1897 年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韓國的佛教再度復興。光武元年（1897）朝廷正式解除禁止僧侶入城的禁令，設置了管理佛教的專門機構——管理署，隨後發布《國內寺刹現行細則》36 條，規定了佛教的義務、僧階的認定、僧衣的顏色、寺刹的等級、僧官的職責等等。韓國的佛教在政府的管理下，以漢城的元興寺作為總宗所，在各道內設首寺一個，佛教以元興寺為中心再次發展起來。1904 年管理署被撤銷，佛教歸地方當局管轄。2 年後僧侶們又成立了佛敎研究會、圓宗宗務院等團體。

五

1910年韓國被日本正式吞并。翌年日本總督重新頒布寺刹令，將朝鮮佛教分爲30個本山或教區，規定寺刹的變更、合并等需經總督的認可。寺刹的土地、森林、佛像、文物、字畫等要得到總督的許可，纔可以處理。管理寺廟的住持等人也要經朝鮮總督的批准，總之朝鮮的佛教完全被日本當局所控制。殖民地的朝鮮佛教爲了爭取自立，始終存在着反對日本利用佛教殖民的活動。1910年朝鮮僧人爲了反對日本曹洞宗對圓宗的控制和結盟，組成了否定圓宗的運動，倡議成立朝鮮的臨濟宗組織。1922年一些朝鮮僧人爲了護教自救，在覺皇寺設立朝鮮佛教禪教兩宗中央教務院。1925年又成立了朝鮮佛教中央教務院。越3年召開朝鮮佛教禪教二宗僧侶大會。1941年朝鮮僧伽以太古寺爲總本山，定名爲統一的曹溪宗，全國僧侶在曹溪宗的旗幟下希望走上統一的道路。

與此同時，朝鮮的佛教教育也有了新的起色。佛教界曾創辦了不少佛教學校、佛教私塾和雜誌報紙等等，致力於培養佛教人才，擴大佛教影響。另外，一些與佛教有關的新興宗教組織也相繼推出，比較重要的有圓佛教、龍華宗、彌勒宗等。有的新興宗教還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鎮壓，被迫解散。

六

1945 年日本投降，韓國獲得解放。不久全國分爲二部分，北方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方是大韓民國。北朝鮮的佛教界曾于 1945 年成立了佛教徒聯盟中央委員會，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近年來北朝鮮的佛教活動有所加強，1986 年佛教徒聯盟加入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組織。

韓國的佛教在戰後發展比較迅速。1945 年 10 月召開了全國僧侶大會，廢除了殖民地時期的寺刹令和有關佛教法令，重新制訂了新的佛教法，成立了“韓國佛教總務院”。政府實行政教分離的政策，保護信仰自由。1954 年成立“韓國佛教信徒會”和“曹溪宗全國信徒會”。以後又成立了“韓國佛教青年組織”、“全韓國青年會”等。過去韓國佛教因受日本佛教某些派別的影響，有的教派仿照日本某些教派的做法，允許僧人娶妻食肉。獨立後，曹溪宗內部一些人要求將此派僧人逐出教團，不承認他們的出家人身分。兩派鬥爭了 7、8 年，最後雙方各自成立了總務院。1970 年蓄髮帶妻一派正式從曹溪宗分出，成立了太古宗。韓國的佛教不僅在民間擁有廣泛影響，還滲透到軍隊裏面。1968 年軍內增設軍人僧侶，軍僧和士兵組成了法友會佛教徒組織。1976 年政府把佛誕定爲國家節日，保護佛教界的活動。1979 年韓國影視界拍攝了高麗藏雕板的故事《八萬大藏經》電影，評論家認爲這是“（韓國）電影史上的最大杰作”。現在韓國的佛教十分盛行，有全國性的“韓國佛教宗團協議會”。佛教宗派有：曹溪宗、太古宗、真覺

宗、佛入宗、元曉宗、普門宗、華嚴宗、總和宗、一乘宗、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大乘宗、法華宗、法相宗、法輪宗、圓融宗、本院宗、三論宗、曹洞宗、彌勒宗、彌陀宗、如來宗、涅槃宗、教宗、念佛宗、觀音宗等。在教理上，有所革新或融合各家教義。韓國的佛教大學有曹溪宗的東國大學、圓佛教的圓光大學等。佛教在韓國人民的生活中有重要的影響，據有關統計，信仰佛教的韓國人占全國人口的 35% 以上，是全國宗教徒的 50%，達 1300 餘萬人。

七

韓國的佛教自傳入至今已有 1500 餘年的歷史，佛教早已成為韓國的傳統宗教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佛教對韓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起到過巨大的作用，在韓國宗教史上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韓國的佛教是自中國傳入的，從歷史上看，到韓國被日本吞并以前為止的一千餘年裏，韓國佛教在其總的發展勢態上都受到了中國佛教的影響。中國隋唐鼎盛期的佛教促成了新羅佛教的廣泛流行。宋明佛教的教禪合一、儒釋道三者的合流，使高麗、朝鮮佛教出現了各教會通的情況。以後禪宗在中國成為佛教主流，在韓國也出現同樣的情況。韓國佛教史上的盛衰消長，往往取決于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干預結果，這一點在中國佛教史上亦是如此，說明在東亞專制封建國家，佛教的發展與統治政權的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

中國佛教對韓國的宗教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種宗教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運動，韓國的佛教同樣對中國佛教也產生過影響。新羅僧元曉所著的《華嚴

經疏》與《大乘起信論疏》（海東疏）在傳入中國後，對中國華嚴宗實際創始人法藏產生過強烈影響，法藏在其所著的《起信論義記》中一再援引元曉的疏解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另外，元曉的注疏也深刻影響了華嚴宗四祖澄觀所作的《華嚴經疏》。元曉所著的“二障義”與法藏在《華嚴五教章》中所述的“斷惑義”、元曉倡導的“空有會通”與法藏宣傳的“空有交徹”思想都是前後一貫，如出一轍。另一位新羅僧圓測是中國唯識學派別之一的“西明派”理論奠基人。他會通新、舊唯識的思想雖然在中國漢地影響不大，但在韓國落根後，迅速傳播至日本，並反過來傳至中國藏地，對曇曠和宗喀巴都有影響。新羅僧順璟來唐，直接從玄奘學習因明，傳得玄奘“真唯識量”，復立“決定相違不定量”，窺基聞而感嘆說：“新羅順璟法師者，聲振唐蕃，學包大小……海外時稱獨步，于此量作決定相違。”新羅僧太賢弘傳玄奘唯識學，其著書也流入中國。新羅僧地藏渡海來華，在九華山示寂，時人尊之地藏菩薩示現，九華山遂成為地藏道場，列為中國四大名山之一。五代時中國天台宗典籍散佚，四明沙門子麟前往高麗搜求甚豐。吳越王錢俶專門派遣使節到高麗索取教典。高麗僧義通來中國天台，學得天台宗旨要，弘揚教觀 20 餘年，被奉為天台十六祖，發展了中國天台宗教學。元世祖欲刻寫藏經，延請善于書寫金字經典的高麗寫經僧 100 人至元都寫經。韓國僧人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和不可磨滅的功績。

過去一些中國和日本出版的韓國佛教書籍中，曾有人認為韓國的佛教宗派是中國佛教宗派的“延長”或“移植”。這種說法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韓國的佛教雖然取自于中